



中 国 共 产 党

四川省攀枝花市组织史资料

1950.3 — 1987.10

中共四川省攀枝花市委组织部
中共四川省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
四川省攀枝花市档案局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攀枝花市组织史资料

1950.3—1987.10

中共四川省攀枝花市委组织部
中共四川省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
四川省攀枝花市档案局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五·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邓洪平

特约编辑:游仲伦

技术设计:李积利

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组织史资料

中共四川省攀枝花市委组织部

中共四川省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四川省攀枝花市档案局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都华兴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mm1/16 印张 22 插页 7 字数 230 千

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2588-2/D·502 印数:1-1500册

定价:52.00元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攀枝花市组织史资料》编纂

领 导 小 组

- | | | |
|-----|------------|-----------------------|
| 组 长 | 陈 樵 | (原市政协副主席) |
| 副组长 | 李仕根 | (原市委常委、办公厅主任、党史工委副主任) |
| | 顾毓秀 | (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
| | 白 岩 |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
| 成 员 | 王中元 | (原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
| | 孙克华 | (原市委组织部调研员) |
| | <u>皮达夫</u> | (原市人事局副局长) |
| | 江宗臣 | (原市档案局局长) |
| | <u>李思校</u> | (原市史志办副主任) |
| | 杨官富 |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
| | 王 言 | (市档案局副局长) |

凡 例

一、《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攀枝花市组织史资料》以攀枝花现行辖区范围适当追溯历史，以文字叙述与名录、图、表相结合的形式，采用白描手法，如实地、系统地反映攀枝花市党委、政权、军事、统战、群团系统及部分企业组织机构的建立、发展过程，为研究党的组织工作历史提供史料。

二、本书由党委、政权、军事、统战、群团五个系统的组织史资料构成，鉴于攀枝花是重工业城市，征得省上同意，增设了部分企业组织史资料。故全书由党、政、军、统、群及部分企业等六个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党、政、军、统、群系统以党委为主，地方组织与企业以地方组织为主；市、县（区）之间，以市级为主。

三、本书采用“分期划块，纵横结合”的体例和坚持“大统一、小灵活”的原则，结合攀枝花市的实际进行编纂。党、政、军、群系统以党史时期为章名各设三章；新时期才建立的市政协未设章；章下设节，节下视情况设目；部分企业组织史资料分企业按时间顺序分机构沿革和领导人名录两个部分编纂，不再设章节。

四、时限：上起米易、盐边解放，即 1950 年 3 月，下至党的十三大召开，即 1987 年 10 月。

五、机构

1. 党委系统：市、县（区）委正、副书记、常委；市委正、副秘书长；市、县（区）纪委正、副书记；市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县（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正、副组长；市委（市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工作机构（含党校、党报、机关党委）正、副职；市政、军、统、群系统党组（党委）正、副书记；县（区）委（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工作机构正职。

2. 政权系统:市、县(区)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市人大常委会正、副秘书长;市、县(区)人民政府(革委会)正、副市长(主任),正副秘书长,正、副县长(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人民检察院正、副检察长;市人大工作机构正、副职;市政府(革委会)工作机构正、副职。

3. 军事系统:军分区(市人武部),正、副司令员(部长)正、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县(区)人武部正、副部长,正、副政治委员;武警支队正、副支队长,正、副政治委员。

4. 统战系统:市政协正、副主席、正、副秘书长,工作机构正、副职;县(区)政协正、副主席,秘书长。

5. 群团系统:市、县(区)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侨联、贫协正、副主席(主任、书记)。

6. 部分企业:攀钢、攀矿、电业局、十九冶、矿务局党委正、副书记,正、副经理(厂长、主任)。

7. 省、市双重领导的邮电局、气象局、人民银行领导机构及其领导名录。

六、数据:1965年以来全市历年党组织、党员、干部基本情况统计。

七、实行选举制的组织机构,领导名录按届编排;增补或任命的领导成员按任职时间依次编排。

八、市、县(区)委正、副书记在常委名录中不再重列。

九、领导人姓名后一律标明任职起止时间,自然状况(女性、少数民族等)。

十、领导成员任、免职时间,实行选举制的,以选举的时间为准,实行任命制的,以当时的干部管理权限机关行文为准。无法查找原任、免通知或任、免时间与到离职时间相差三个月以上者,以实际到离职时间为准。个别难以查清的,以“季度”、“上半年、下半年”或“?”代之。

十一、1966年市级机构实行军事化编制,市委于同年4月将各部门领导干部的任职请示分别上报冶金部党委和四川省委,后因“文革”开始,冶金部和四川省委组织部通知待运动后期办理。同年5月6日,市委书记徐驰,在市直机关科以上干部会上宣布了各部门领导干部任职名单,故这一批领导干部的任职时间一律以1966年5月为准。

十二、按党史时期划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止于1966年4月,鉴于攀枝花的特殊情况,领导名录下延至1966年12月,“文革”时期不再重复;1967年1月,各组织机构瘫痪,各级领导干部无法行使职权,故领导干部任职截止时间除正常调动外,均以1966年12月为限。

十三、建国前,今攀枝花所辖区内,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共地下党员活动,没有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故纳入概述中叙述。

十四、盐边、米易两县 1978 年 10 月以前隶属西昌专署,为保持资料完整,从 1950 年开始,两县组织史资料一并纳入本书各时期内编写。

十五、1987 年 3 月,渡口市更名为攀枝花市,为保持历史原貌,各组织机构前面须冠以市名的,更名前一律使用渡口市名称。

十六、本书数字使用,一律按照 1986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七、本书收录的组织机构、领导名录,旨在“历史”、“育人”、“资政”,与其级别、待遇无关。

总 目 录

凡例	
概述	(1)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攀枝花市组织史资料	(7)
四川省攀枝花市政权系统组织史资料	(143)
四川省攀枝花市地方军事系统组织史资料	(251)
四川省攀枝花市统战系统组织史资料	(271)
四川省攀枝花市群团系统组织史资料	(287)
四川省攀枝花市部分企业组织史资料	(317)
后记	(341)

概 述

四川省攀枝花市是以本市生长的攀枝花命名的城市,原名四川省渡口市,是在 60 年代中期西南大三线建设中崛起的一座新兴工业城市。20 多年来,已经建成攀枝花钢铁公司、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攀枝花矿务局等一批大中型企业,形成了以钢铁为主体的工业基地,并正在成为川西南与滇西北的经济重镇。

攀枝花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雅砻江与金沙江汇合处,东经 $101^{\circ}08'$ 至 $102^{\circ}15'$, 北纬 $26^{\circ}05'$ 至 $27^{\circ}21'$ 。北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德昌县、盐源县,南连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永仁县,东邻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会理县,西界云南省华坪县。成昆铁路途经攀枝花车站(原金江站),北距成都 749 公里,南达昆明 351 公里。市辖盐边、米易两县和东区、西区、仁和区,全境面积 7514 平方公里,人口 85 万人。

攀枝花地区资源十分丰富,到 1987 年,已探明钒钛磁铁矿储量达 100 亿吨,占全国同类型铁矿储量的 80% 以上,为全国三大铁矿产区之一。其中,钒(V_2O_5)的储量占全国的 63%,居世界第三位;钛(TiO_2)储量占全国的 93%,居世界第一位。同时,还含有钴、镍、铬、锰、镓、铈、硒、铂族金属等 20 多种元素,是以铁、钒、钛为主的多金属共生矿。煤炭储量达 7 亿吨,尚有丰富的石灰石、白云石、耐火粘土等冶金辅助原料,具有发展钢铁钒钛工业和进行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优越条件。水能资源可开发量达 409.6 万千瓦,正在兴建的雅砻江二滩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 330 万千瓦,年发电量 170 亿度,其单机与总容量、年发电量均居全国第一。森林覆盖率为 22.71%,木材蓄积 2700 万立方米,列入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攀枝花苏铁”,被称之为“植物活化石”,并列为“巴蜀三宝”,其分布面积之大,植株数量之多,全国少有。1965 年 11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受党中央委托,亲临攀枝花审定

建设方案时，盛赞“这里得天独厚”。

攀枝花地区自明代以来，其归属虽数次更易，但至建市前仍属今四川、云南两省的盐边、德昌、米易、会理和华坪、永仁等县。这里山高谷深，人烟稀少，交通闭塞，被称之为“穷山恶水”，“不毛之地”。1932年，地质工作者即证实攀枝花地区有磁性铁矿，1940年前后，又对铁矿和煤矿等进行过地质调查，1941年认定为钒钛磁铁矿。当时，一些实业界人士和地质学专家对发展中国西南钢铁事业抱有满腔希望，终因时代的限制及交通不便等原因未成为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攀枝花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被提上党和国家重要议事日程。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布局问题。这年，国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在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报告在西南地区金沙江畔的攀枝花找到了大型铁矿。1957年8月，冶金工业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总结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安排(草案)》中，提出了“二五”期间“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地方中小、准备两大”(钢铁厂)的钢铁工业发展计划。“准备两大”，其中之一就是以攀枝花铁矿资源为基础而建设西南钢铁厂。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期间，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毛泽东主席写了《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的报告，明确提出“二五”期间建设四川攀枝花钢铁厂。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对此作了批示，指出“二五”期间，除了在省、市、自治区积极建设中小型钢铁企业以外，应当及时准备西南、西北、鄂西、粤北几个较大钢铁厂的建设工作。

成都会议后，四川省、冶金部及国家各有关部门立即进行厂址选择和规划，着手组建西昌钢铁公司，陆续集结建设队伍等。但是，由于自然灾害和经济工作上的失误，1962年3月西钢下马，同年7月成昆铁路停建。

1964年，国民经济经过调整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在安排第三个五年计划时，突出了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发展方向，并把加强国防放在了首位。这年春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交关于开发攀枝花资源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同意了这个报告。同年5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发出了建设大小三线的指示，把开发攀枝花资源，建设攀枝花工业基地作为重要问题提了出来。毛泽东主席针对攀枝花建设说：“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同年5月10日，毛泽东主席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再次提出：“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6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又强调指出：“搞一、二、三线，打起仗来准备打烂。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潦草。”8月，他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厂问题。现在抓是抓了，但要抓紧，要

估计到最困难的情况，有备无患。”“现在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9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谈到修建西南铁路时又一次说：“不搞攀枝花，这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早知道攀枝花有矿嘛，为什么不搞？！你们不去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如果说没有投资，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建设攀枝花的重大决策之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4年7月召集国家计委、冶金、地质、铁道、交通、机械、电力等部门的负责人会议，部署攀枝花建设的有关事宜。他提出要尽快组织一个攀枝花建设专家考察组，到攀枝花地区实地考察，提出建设方案和厂址选择意见。这个考察组，由各专业的专家和领导组成，程子华同志任组长。要及早到现场去工作，一个半月内完成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不迟于8月底回京汇报。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基本建设筹备小组，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任组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任副组长，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直接领导下，负责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规划、厂址选择等工作。

1964年9月，国家冶金、煤炭、电力、交通、建筑等部门的建设队伍，按照中央部署陆续进入攀枝花，进行建设前期准备工作。中共中央西南局在现场建立了“攀枝花工业基地临时领导小组”，负责统一指挥。

196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需要，决定成立中共攀枝花特区党委、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和攀枝花建设指挥部。同年3月特区党委、人委、建设指挥部正式成立。同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攀枝花特区改称四川省渡口市，特区各领导机构随之更名。同年7至12月，国务院和四川省批准从云南省永仁县、华坪县和四川省盐边县、会理县划出部分区域，计43个人民公社，1842.5平方公里，作为渡口市的行政区域。

攀枝花开发建设初期，按照全面规划、集中领导、统一管理的建设体制，特区党委（渡口市委）根据工业基地建设的需要，迅速建立、健全了各级组织机构。特区党委建立了建设指挥部政治部，设置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等必要的办事机构；为了加强基地建设的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在建设指挥部下面，按照行业分设冶金、煤炭、电力、交通、建工等专业指挥部，建立了各指挥部党委；成立市人民武装部；建立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筹备和建立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调整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了大河、大田、金江、玉泉4个农村区公所和区委，作为市委、市人委派出机构。1966年5月，市级机构实行军事化编制，成立渡口总指挥部、政治部和后勤部，进一步加强了市委对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在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中央各部门派出得力干部担任各专业指挥部党政领导职务，并陆续从全国各地调进一大批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与此同时，抓紧培养、大胆选拔年轻干部进入各级领导岗位。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建立健全了基层党组织，挑选、配备基层干部、

健全支部委员会。1965年紧紧围绕加快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在全市各级党组织中开展了以“五好”为目标,以“三通一住”(通路、通水、通电、住房),“四大一促”(以反潦草、反浪费为中心的大清、大算、大建、大教,促进管理),“三高一低”为不同内容的比、学、赶、帮、超竞赛活动,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注意培养和吸收优秀分子入党,强调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专业技术骨干、尤其是无党员的“空白”生产队和生产班(组)发展党员。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使渡口地区刚建立或正在筹备的党委、政权、群团等组织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文革”初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采取了稳定措施,各级组织机构尚能坚持工作,1967年初,党、政、群各组织机构遭到冲击,先后陷入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五师和市人民武装部奉命“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组建了市和各部门、各指挥部生产领导机构。1968年3月以后陆续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其后又建立了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革委会及其下设的办事组、政工组、生产组、人保组等办事机构,取代了党政领导机关及其工作部门的全部职能。1971年经过整党之后,市第一次党代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渡口市委,陆续恢复建立了行政机关职能部门,并逐步向党政分开转变,恢复了各级审判机关和一些群团组织。“文革”后期,在“反复辟倒退”、“反翻案”思潮干扰下,全市工农业生产和党的组织建设受到严重影响。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从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攀枝花的开发建设跨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委领导全市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和粉碎其帮派体系的斗争,澄清思想是非和路线是非,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及其他各项政策;开展整党整风、整顿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干部教育和党员教育、健全党的生活,把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焕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及时引导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进一步健全了各级党委领导机构及其工作机构。从第三届市委开始,党委不再直接指挥经济、行政事务,不设不在政府中任职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或常委,不设与政府部门重迭对口的工作部门,党委集中主要精力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加强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政权、统战、群团系统各部门、单位普遍建立了党组(党委)。在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上,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大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逐步实现了新老干部的合作交替;大规模地开展干部培训工作,全面提高干部素质;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和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在政权建设方面,建立健全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关;撤销各级革命委员会,恢复建立各级人民政府,并设置相应的工作机构;进行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监督、服务工作,逐步实现政企分开。地方军事系统,1982年组建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渡口市支队;1986年市人民武

装部改编为军分区,各区、县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统战系统从1980年起,陆续恢复和建立了各县、区政协委员会,建立了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群团系统,工、青、妇等组织建立健全了代表大会选举制,新建了科协、文联、侨联等群团组织。这一时期,全市行政区划变动较大,1978年,会理县的红格、新久、猛新、和爱4个人民公社及西昌地区的米易、盐边两县,共5241.6平方公里地域划归渡口市。至此,基本形成了今天的攀枝花市政区。1987年1月,国务院批准渡口市更名为四川省攀枝花市。

攀枝花地区从1928年开始,已陆续有中共地下党员在此进行革命活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共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共产党员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928年初,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委员严英俊、中共党员黄日生先后到达盐边县,这是最早来攀枝花地区的中共党员。严英俊(又名严佑陵),云南省华坪县中心镇人。1926年在广州大沙头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滇军)政训班学习时加入共产党。首任中共云南省特委委员,负责学运、民运工作。1928年1月,严英俊等10余名中共党员在云南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经组织营救出狱。不久,严英俊通过亲友关系到盐边县喇撒田(现盐边县永兴乡)隐蔽。在盐边期间,严英俊利用其教师身份,向学生宣讲《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文章,并同黄日生一起传播“五四”新文化。1935年再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经保释出狱。盐边县解放后,曾任县政府司法科科长,1951年因镇反受审病故。黄日生,盐边县永兴乡人。1926年8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经王德三、华昌杰介绍加入共产党。先后在云南省昆明、宜良县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8月,中共宜良地下组织被破坏,黄同党组织失去联系。1928年春节后,黄日生辗转回到盐边县,在现永兴乡小学任教,同严英俊一起在学生中和社会上开展新文化启蒙活动。解放后,先后在盐边中学、会理一中教书,现已退休。

1935年5月,中共西昌特支宣传干事陈野苹,在冕宁抗捐军武装斗争失败后,同中共地下党员康集先、赵光洁(原名赵宗辉,化名赵玉涛,盐边县新坪乡梭罗村人,1933年在西昌省立二师经陈野苹介绍加入共产党)先后到昆明寻找党组织,未接上关系。遂于1936年1月来到盐边县喇撒田(今盐边县永兴乡)以教书为掩护,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团结进步师生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夏初,陈野苹被国民党政府发现,即离开盐边去了昆明。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攀枝花地区开展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地下斗争。1948年冬,中共会理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龚成林,在今米易县主持开办了“弯坵垦殖场”,作为西昌、德昌、会理地下党及云南游击区的地下联络点。1949年7月,中共会理地下组织派廖学贵到会理西北区(今米易县丙谷乡)发展党的组织,筹建地下武装和开展民族上层策反工作,并从会理调去盛光举、余体奎等地下党员,发展了罗扶元、张荫伯二人入党,形成了丙谷晓露桥党的活动中心,时有中共党员6名,由廖学贵负责,并于1949年10月派罗扶元、郑良两名地下党员前往德昌县普威做争取土司吉绍虞的工作。1950年7月中旬,由于形势突变,

地下党员分散隐蔽，筹建中的地下武装亦未成功。

1949年9月，中共西昌地下组织按照上级关于民族上层统战策反工作部署，派出地下党员马仲亢到德昌普威（今米易县普威乡），以普威土司吉绍虞开办的吉家小学教师和吉家教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统战工作，并发展彝族进步青年刘世昌入党。同年12月，中共西昌地下县委又派县委委员胡崇绅前往普威，加强对吉绍虞的统战工作。并建立了本市境内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西昌县委领导的普威支部，由马宗亢任支部书记。普威地下党支部成立后，陆续发展了傅正达、王愿臣、罗世维三人入党。1950年初，中共普威支部同会理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中共普威支部移交会理地下党组织，直至1950年3月当地解放。

建国前到攀枝花地区解放，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影响长达22年。1965年建市到1987年，中共攀枝花地方组织建设也活动了22年。在这期间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前进。到1987年10月，全市地方党委由建市前的2个增加到5个，基层党委由29个增加到259个，党支部由158个增加到3235个，党员由3112名发展到58350名。

中国共产党
四川省攀枝花市组织史资料
(1950.3—1987.10)

目 录

第一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1)
第一节 领导机构	(12)
第二节 工作机构	(13)
第三节 政军系统党组(党委)	(17)
一、政权系统党组(党委)	(17)
二、渡口市人武部党委	(19)
第四节 各县(区)委	(19)
一、中共盐边县委	(19)
二、中共米易县委	(24)
第二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34)
第一节 领导机构	(36)
一、延续到本时期的中共渡口市委	(37)
二、中共渡口市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	(37)
三、中共渡口市第一次代表大会	(37)
第二节 工作机构	(40)
一、市委工作机构	(41)
二、党的核心小组工作机构	(41)
三、第一届市委工作机构	(41)
第三节 政军系统党组(党委)	(44)
一、政权系统党组(党委)	(44)